

有版權

夜記

魯迅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實價五角

巴金主編 文藝學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夏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赫，美國嗎！尹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魯迅庚報告
魯迅散文
魯彥散文
黎烈文散文
麗尼散文
沈她文書信
李健吾劇本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二十九年三月六版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槓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三四五集各書均已出版。第六集自二十九年三月起陸續出版。

目錄

一九三四年

病後雜談：

病後雜談之餘：

一九三五年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題未定」草（一—五）……四八

陀斯妥夫斯基的事……六九

「題未定」草（六—九）……七二

一九三六年

| | |
|----------------|-----|
| 我要騙人····· | 九六 |
| 「出關」的「關」····· | 一〇三 |
| 半夏小集····· | 一一一 |
| 「這也是生活」····· | 一一七 |
| 死····· | 一二四 |
| 女郎····· | 一三二 |
|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 一四一 |
| 後記 | |

病後雜談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里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餓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却模模糊糊，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

看好像離奇，其實却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好能，就是流行性感。但過了流行性感，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却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裹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沈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下

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爲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歎一口氣，將牠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地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起的阮嗣宗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稅。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吶

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烟囪」的，然，還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喫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

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盤」。

二

爲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于「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乾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爲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却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就成爲「杭育杭育派」了。這關鍵，只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却是永遠執着，因此也就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者不失爲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爲「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姬 隅 躍 清 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

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鑑」，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得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爲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却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于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牠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喫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面裝着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于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歷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歷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爲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

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搗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緘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氓」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氓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

清的柱石，封爲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爲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子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指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癒的。殘酷的事實儘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我想他是一定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一株株是文章，節節

是忠腸，」就很富于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凌遲，却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着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裡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他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閒漁閒

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却又尋不出什麼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容易在愛文義路找着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于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覆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託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滿是前清遺老的口

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着末筆。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却又引明遺老爲同調，只着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于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爲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爲藝術而藝術」成爲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爲這是因爲「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面說過的「蜀龜鑑」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贊」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繭，雅終召旻，託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于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終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閒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面却刻着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為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為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裏。思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却，不甚了然，彷彿有些關心，却又

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却是却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並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喫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骸骸，於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骸骸」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于我矣」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姑妄言之！」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却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為不大好的，尤其是對於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

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後來二女獻詩于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

這真是「曲終奏雅」，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聖明，好人也終於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爲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里爲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有些是凶殘狠毒，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尙饗」的名文，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誌，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並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爲多數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守節」在那時，其實是只准「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裏，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麼？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謬類編」（續補卷上）裏，這纔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

「……考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鬢半墮臨青鏡，兩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爲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爲不倫。宗正睦樸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僞作，則鐵女之詩可知……」

「國朝文纂」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並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爲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

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面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范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首，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尙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麼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豔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邱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着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着寫遺書。但我想在這里趁便拜託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麼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輓聯的鬪法場，爲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于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于我死人，于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輓聯做得好，不過是輓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爲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閒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功夫，標點不要錯。

十二月十一日。

病後雜談之餘

——關於「舒憤懣」——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氓」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氓尚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閒錄」好像是一部少

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而知。記得「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拖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窩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却早已模糊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

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卻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鉞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
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

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

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禁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

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般結語，有兩事使我喫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

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于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比于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

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文字獄的血迹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饑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未必看見。現在不必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燬，抽燬，剝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是「琳琅祕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

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祕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叢書，但其中却保存着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爲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里——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

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圍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兇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兇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末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里，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班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慄，囁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
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騎却虜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
恐怖之號，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
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眦睨中國之地
于今日也。

四庫本

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斥候不明，
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
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
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謂竟釀患滋禍一
于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于胡虜乎？

忍棄上皇之子于異地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

(無)

猶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

夷狄族帳，大小見于史冊者百十，今其存

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

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襪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

故相家皆攜老嫠幼，棄其籍而去，焚

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掠之餘，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卽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爲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于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羨慕「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纔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爲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譚，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

慢的吸烟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于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于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鬮嘴，使彼此互罵爲「豬彘」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于懷了惡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爲拿了什麼地

方的東西，迷了什麼斯基的理論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默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

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于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裏通外國」的人，于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言行一致」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之所謂文學家裏，也還有人以這一點自豪，但他們却不知道他們一

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頌·革·命·功·德·以·「舒·憤·懣」·那·麼·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剪·辮·子·。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會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餒萬丈。

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牠，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了。

那麼，我的「舒憤懣」恐怕也很難傳給別人，令人一樣的憤激感，歡喜憂愁的罷。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後雜談」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錢謙益編的「歷朝詩集」裏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譌類編」完畢。今天「四部叢刊續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抄」却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面。現在就照抄在這里，並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並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却）無家。雲鬢半挽（顰）臨粧（靑）鏡，兩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爲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以死殉」并記或一說云，「鐵二子無女」那麼，連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爲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爲是粉飾的。「弇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諭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于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着因爲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裏面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子常人爲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却好像連形像也成爲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于只好採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却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裏的插畫；一次是梁啓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爲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着一把劍，或者腋下挾着一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後來我會到山東旅行。在爲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着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着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註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却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爲了覺得與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爲得計呢，還是爲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於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還作爲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裏。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爲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

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謔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零零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裡，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裏的什麼地方其名爲「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爲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喫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爲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于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爲「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爲他自己計，這固

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却也許並不是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着的時候却是頗喫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爲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爲權臣所輕蔑，爲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爲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爲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爲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繫着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裏的肉醬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爲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爲他不會噲噲了，種種的權勢者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擡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

入的釋迦牟尼來，却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却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却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衆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着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

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爲「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却，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着「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却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着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于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牠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着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却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尙，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爲或一目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于是要打他的慾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會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爲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爲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爲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裏，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獸頭獸腦的地方，然而作爲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裏去了。因爲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

着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里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衆，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爲聖人，却不覺得他是聖人；對于他，是恭謹的，却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畫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爲了治民衆者，卽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爲民衆本身的，却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爲權勢者們的聖人，終于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衆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爲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着脚，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事物，雖是「愚民」，却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題未定」草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着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却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却没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喫。「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

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爲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零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綫，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嗚呼——這裡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牠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爲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

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牠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于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乾的：硬着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做「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會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

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沈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牠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着，想打盹，筆一在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麼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牠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爲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効力也愈廣大。

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爲數句，很近乎解釋。我的意見却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如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牠必須有異國的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牠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却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却還是使用的，因爲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做効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模仿英文之 *historical-ly* 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做効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爲「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卽所謂「保得自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里只有幾個洋教堂，裏面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許多洋人，因此有着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傢伙，專用于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瑣瑣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却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

換錢，西崽和華僕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里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羣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羣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羣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羣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却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有過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兼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爲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仰夷，其實却是「滿慮」；古之「滿慮」，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爲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

「……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

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却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爲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在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佛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鎗砲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

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却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刺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于「英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却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訓詞移到這裏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法德文人」在中國却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後來却展開，盛大了。學德語

盛于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于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爲了商務，二爲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爲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紆，連介紹最大的「已經聞名」的沙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于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恆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

門，執塗人臂，悍然割之，塗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
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六月十日。

四

（不發表）

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閒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于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

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豫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于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攔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之望，到後來却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于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M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註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只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只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里，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捨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于是便有許多人跟着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着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穩做的（其實是只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于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于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于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

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却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爲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羣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爲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爲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爲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爲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扎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

衆」的責任。可是我們却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只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扎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

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也是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于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只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爲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爲他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紹介紀德、巴爾扎克之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豫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觀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爲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只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却連他本

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于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却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有「奴性」，只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于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維支的祝賀日，我却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于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只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一略論

「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羣，有這麼相近，却又這麼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里，自以爲總算又鈎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八月十六日。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爲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麼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却沒有很細心的讀過他的作品。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巖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就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喫驚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爲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驗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陀思妥夫斯基，則彷彿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着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爲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廢書不觀。

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這倫勃羅梭式的說明，在現今的大多數的國度裏，恐怕實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們的贊許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制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麼，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着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

不過作爲中國的讀者的我，却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堅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歲的所謂節婦身上，也許偶然可以發見罷，但在一般的人們，卻沒有忍從之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僞。因爲壓迫者指爲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僞，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却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終於也並不只成了說教或抗議就完結。因爲這是當不住的忍從，太偉大的忍從的緣故。人們也只好帶着罪孽，一直闖進但丁的天國，在這里這才大家合唱着，再來修鍊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墜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

十一月二十日。

「題未定」草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塾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

「吶喊」和「彷徨」之下，就註着一個「銷」字，「銷」者，銷燬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會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却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于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着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于「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委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

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却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爲「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爲「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難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爲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爲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澈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爲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爲陳迹，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叢書，請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怒然憂之，以爲足煽復古之燄。我却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

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裡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並非他的什麼「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爲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裡仍得舉，因爲寫到這里，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于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瑯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塗爲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却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裡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是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乾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裡，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裡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塗的，是「摘句」。牠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惆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爲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爲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爲它對於我啓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峯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

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個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峯，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託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峯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于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于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一曲終人不見」

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類，就往往爲人所稱道。因爲眼前不見，而遠處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祇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衆生擾攘，而眉宇間却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祇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

一般詩裏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混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于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于人一樣。至于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着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

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于大煞風景，但有時却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牠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着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喫驚而失笑了，但接着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啓示。這啓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牠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牠現在之見得「祇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稜和

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牠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于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我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
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
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
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
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

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糊，不過這含糊，却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峯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只有一部「大歷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簡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要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

本爲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爲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爲「靜穆」，是因爲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爲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爲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爲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

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却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羣，但使謙讓者潑刺起來，却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

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于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爲「愛惜」。集子裏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鬚鬚；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漫罵誣蔑的文章，以爲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羣，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牠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却也有酷吏傳和佞倖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爲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和人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我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爲明鎗，但又說這是因爲被誣爲「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牠消滅，

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稜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却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事物，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羣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瓊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爲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爲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爲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此水秦銅，並不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爲選詩的極境，「並不立意見」爲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爲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爲羣醜，不久卽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里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沈，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碑……」

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爲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叢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叢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叢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羣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爲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于是凡有黨社，必爲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

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爲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爲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爲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敍魏忠賢兩次磨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使受

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罷，被愚弄騷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倣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殼的罷，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開北被暗殺了。忽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賣食物的小商人了，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

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爲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爲了聰明，却只因爲懶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爲「事變」似的——的火綫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着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里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爲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這秘密。其實，是在下着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的確。中國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爲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爲了無論那里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章，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

和從不見有記者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她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着這收條，就無論到那里，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於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

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爲着

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進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後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

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爲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于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

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閒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喫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乾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溼，用溼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

學問不畢業，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

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二月二十三日。

「出關」的「關」

我的一篇歷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但大抵自謙爲「讀後感」。於是有人說：「這是因爲作者的名聲的緣故。」話是不錯的。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麼的受批評家注意，偶或爲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麼「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噯哩咕嚕」呀，羣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然而別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臉了，他戟指大叫道：「我們中國有半個託爾斯泰沒有？有半個歌德沒有？」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不過其實也不必這麼激昂，因爲從地殼凝結，漸有生物以至現在，在俄國和德國，託爾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個。

我並沒有遭着這種打擊和恫嚇，是萬分幸福的，不過這回却想破了向來對於

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這也並無他意，只以為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評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咱們也不妨談一談而已。

看所有的批評，其中有兩種，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縮得更小，或者簡直封閉了。

一種，是以為「出關」在攻擊某一個人。這些話，在朋友閒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為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却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只知道，也只愛聽別人的陰私的。不幸我那「出關」並不合于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種小報上批評道：「這好像是在諷刺傅東華」，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見並不『是在諷刺傅東華』了，這不是該從別處着眼了麼？然而他因此又覺得毫無意味，一定要實在『是在諷刺傅東華』，這才嘗出意味來。

這種看法的人們，是並不很少的，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會有小政客和

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却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但小說裏面並無實在的某甲或某乙的麼？並不是的。倘使沒有，就不成爲小說。縱便寫的是妖怪，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上相像。有誰相像，就是無意中取誰來做了模特兒，不過因爲是無意中，所以也可以說是誰竟和書中的誰相像。我們的古人，是早覺得做小說要用模特兒的，記得有一部筆記，說施耐菴——我們也姑且認爲真有這作者罷——請畫家畫了一百零八條梁山泊上的好漢，貼在牆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寫成了「水滸」。但這作者大約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倆，而不知道畫家的能力，以爲他倒能憑空創造，用不着模特兒來作標本了。

作家的取人爲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這比較的易于描寫，但若在書中是一個可惡或可笑的角色，在現在的中國恐怕大抵要認爲作者在報個人的私譽——叫作「個人主

義」有破壞「聯合戰線」之罪，從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但因為「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後一法的，當初以為可以以不觸犯某一個人，後來才知道倒觸犯了一個以上，真是「悔之無及」，既然「無及」，也就不悔了。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觀默察，爛熟于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不過我在這裏，並不說傅東華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兒，他一進小說，是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我對於這資格，也毫無輕視之意，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霽，「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却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霽

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却較爲永久的話罷。

還有一種，是以爲「出關」乃是作者的自況，自況總得占點上風，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說得最淒慘的是邱韻鐸先生——

「……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裏的影子，就只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着我們的作者。要是這樣，那麼，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魯迅先生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是不在這裏的……」（「每週文學」的「海燕讀後記」）

這一來真是非同小可，許多人都「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前面一個老子，青牛

屁股後面一個作者，還有「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還有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竟一窩蜂似的湧「出關」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個全身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會不再出關，回上海請我們喫飯，出題目徵集文章，做道德五百萬言的了。

所以我現在想站在關口，從老子的青牛屁股後面，挽留住「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以及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首先是請不要「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因為「本意是不在這裏，」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沒說出在那裏，也許看不出在那裏。倘是前者，真是「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倘因後者，那麼，却是我的文字壞，不夠分明的傳出「本意」的緣故。現在略說一點，算是敬掃一回兩月以前「留在腦海裏的影子」罷——

老子的西出函谷，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爲一定

的事實。至于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却是我的意見：老，是尙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尙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却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爲而無不爲』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爲，就只好一無所爲，因爲一有所爲，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無不爲』了。我同意于關尹子的嘲笑：他是連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毫無愛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這樣的淒慘，我想，這大約一定因爲我的漫畫化還不足夠的緣故了，然而如果更將他的鼻子塗白，是不只『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這樣子。

再引一段邱韻鐸先生的獨白——

『……我更相信，他們是一定會繼續地運用他們的心力和筆力，傾注到更有利於社會變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加強起來，同時使凡

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轉爲有利的力量，以聯結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

一爲而「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于「無爲而無不爲」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然而我「們」和邱先生不同之處却就在這裏，我「們」並不「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會「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的關鍵也在這裏。他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于是不禁寫了「巨大無比」的抽象的封條，將我的無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閉了。但我疑心邱韻鐸先生以及像邱韻鐸先生樣的作家們的本意，也許倒只在這裏的。

四月三十日。

半夏小集

一

A：你們大家來品評一下罷，B竟蠻不講理的把我的大衫剝去了！

B：因為A還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剝牠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還不屑剝呢。

A：不過我自己却以為還是穿着好……

C：現在東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這利己主義者，你這豬獃！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侶，這昏蛋！

二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三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爲，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四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後來自己壽終林下的逸民。兒子已不妨應試去

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于默默抗戰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五

A：B，我們當你是一個可靠的好人，所以幾種關於革命的事情，都沒有瞞了你。你怎麼竟向敵人告密去了？

B：豈有此理！怎麼是告密！我說出來，是因為他們問了我呀。

A：你不能推說不知道嗎？

B：什麼話？我一生沒有說過謊，我不是這種靠不住的人！

六

A：阿呀，B先生，三年不見了！你對我一定失望了罷……

B：沒有的事……爲什麼？

A：我那時對你說過，要到西湖上去做二萬行的長詩，直到現在，一個字也沒有，
哈哈！

B：哦……我可並沒有失望。

A：你的「世故」可是進步了，誰都知道您記性好，「貴人嚴」不會這麼隨隨便便的，您現在也學會了說謊。

B：我可並沒有說謊。

A：那麼，您真的對我沒有失望嗎？

B：唔，無所謂，不失望，因爲我根本沒有相信過你。

七

莊生以爲「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蛄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爲

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却没有這麼曠達。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獼皮狗們喫。

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羣獼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八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爲「我的毒」(Mes Poisons) 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輕蔑着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却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九

作爲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裏，這人總以爲是晦氣的。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爲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糞，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迴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

「這也是生活……」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爲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業了業，却只好到襪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

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着，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麼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治。自然，接連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

像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會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

無法發表，印出來只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讀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評家。于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里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里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看去的看一下。』

『爲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爲我在講昏話。

『因爲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

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牠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爲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人用的「烏鷄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錯的。

刪蕙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爲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即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面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祕密」，但第一面卻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縹緲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

喫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喫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咕咚的響，牠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為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却立刻又會萬萬興興的把這西瓜喫下，成爲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喫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喫，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喫，味道好，却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喫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鬪起來就和喉乾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喫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却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喫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喫下去。

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八月二十三日。

死

常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 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爲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爲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卻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爲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忘掉則有之。大家所相信的死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卻還不失爲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卻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

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爲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爲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卻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爲死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于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

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子孫，每年可喫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閒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沈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利于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爲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

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 S 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

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爲我倘會貴爲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

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

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

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
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
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卻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
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
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讎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這對於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但其實，是並不的確的；這地方，無論爲那一樣都可以用。

不過一般的紹興人，並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復，卻也是事實。單就文藝而言，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復讎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我以爲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我已經在「朝花夕拾」裏得了介紹給全國讀者的光榮了，這回就輪到別一種。

「女吊」也許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話，只好說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實，在

平時，說起「弔死鬼」，就已經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為投繯而死者，向來以婦人女子爲最多。有一種蜘蛛，用一枝絲掛下自己的身體，懸在空中，「爾雅」上已謂之「蜺，縊女」，可見在周朝或漢朝，自經的已經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時不稱牠爲男性的「縊夫」或中性的「縊者」。不過一到做「看戲」或「目連戲」的時候，我們便能在看客的嘴裏聽到「女弔」的稱呼。也叫作「弔神」。橫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號的，我還沒有發見過第二位，則其受民衆之愛戴也可想。但爲什麼這時獨要稱她「女弔」呢？很容易解：因爲在戲臺上，也要有「男弔」出現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紹興，那時沒有達官顯宦，所以未聞有專門爲人（堂會？）的演劇。凡做戲，總帶着一點社戲性，供着神位，是看戲的主體，人們去看，不過叨光。但「大戲」或「目連戲」所邀請的看客，範圍可較廣了。自然請神，而又請鬼，尤其是橫死的怨鬼。所以儀式就更緊張，更嚴肅。一請怨鬼，儀式就格外緊張嚴肅，我覺得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許我在別處已經寫過。「大戲」和「目連」雖然同是演給神人鬼看的戲文，但兩者又很不同。不同之點：一在演員，前者是專門的戲子，後者則是臨時集合的 Amateur——農民和工人；一在劇本，前者有許多種，後者却只好歹總只演一本「目連救母記」。然而開場的「起殤」中間的鬼魂時時出現，收場的好人升天，惡人落地獄，是兩者都一樣的。

當沒有開場之前，就可看出這並非普通的社戲，爲的是臺兩旁早已掛滿了紙帽，就是高長虹之所謂『紙糊的假冠』是給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內行人，緩緩的喫過夜飯，喝過茶，閒閒而去，只要看掛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麼鬼神已經出現，因爲這戲開場較早，「起殤」在太陽落盡時候，所以飯後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會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殤」者，紹興人現已大抵誤解爲「起喪」，以爲就是召鬼，其實是專限於橫死者的。「九歌」中的「國殤」云：「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當然連戰死者在內。明社垂絕，越人起義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稱爲叛賊，

我們就這樣的一同招待他們的英靈。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臺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面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會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臺去，說明志願，他們就給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多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刺在墳墓上，然後拔叉馳回，上了前臺，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臺板上。我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臺，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頓竹籐（這是紹興打孩子的最普通的東西），一以罰其帶着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我卻幸而從來沒有被覺察，也許是因爲得了惡鬼保佑的緣故罷。

這一種儀式，就是說，種種孤魂厲鬼，已經跟着鬼王和鬼卒，前來和我們一同看戲了，但人們用不着擔心，他們深知道理，這一夜決不絲毫作怪。於是戲文也接着開場，徐徐進行，人事之中，夾以出鬼：火燒鬼，淹死鬼，科場鬼（死在考場裏的），虎傷鬼

……孩子們也可以自由去扮，但這種沒出息鬼，願意去扮的並不多，看客也不將牠當作一回事。一到「跳弔」時分——「跳」是動詞，意義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鬆緊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涼的喇叭來，中央的橫梁上，原有一團布，也在這時放下，長約戲臺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們都屏着氣，臺上就闖出一個不穿衣褲，只有一條犢鼻褌，面施幾筆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弔」。一登臺，徑奔懸布，像蛛蜘蛛的死守着蛛絲，也如結網，在這上面鑽，掛。他用布弔着各處：腰，脅，胯，下，肘，變，腿，變，後項窩……一共七七四十九處。最後才是頸子，但是並不真套進去的，兩手扳着布，將頸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這「男弔」最不易跳，演目連戲時，獨有這一個腳色須特請專門的戲子。那時的老年人告訴我，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也許會招出真的「男弔」來。所以後臺上一定要扮一個王靈官。一手捏訣，一手執鞭，目不轉睛的看着一面照見前臺的鏡子。倘鏡中見有兩個，那麼，一個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將假鬼打落臺下。假鬼一落臺，就該跑到河邊，洗去粉墨，擠在人叢中

看戲，然後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會在戲臺上弔死；洗得慢，真鬼也還會認識，跟住他。這擠在人叢中看自己們所做的戲，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歷一樣，也正是一種缺少不得的過渡儀式。

這之後，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髮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臺，內行人說：這是走了一個「心」字，爲什麼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紅衫。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但再看後來的文字和圖畫，却又並無一定顏色，而在戲文裏，穿紅的則只有這「弔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爲她投繯之際，準備作厲鬼以復讎，紅色較有陽氣，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紹興的婦女，至今還偶有搽粉穿紅之後，這才上弔的。自然，自殺是卑怯的行爲，鬼魂報讎更不合于科學，但那些都是愚婦人，連字也不認識，敢請「前進」的文學家和「戰鬥」的勇士們不要十分生氣罷。我真怕你們要變呆鳥。

她將披着的頭髮向後一抖，人這才看清了臉孔：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聽說浙東的有幾府的戲文裏，弔神又拖着幾寸長的假舌頭，但在紹興沒有。不是我祖護故鄉，我以為還是沒有好；那麼，比起現在將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時式打扮來，可以說是更澈底，更可愛。不過下嘴角應該略略向上，使嘴巴成爲三角形：這也不是醜模樣。假使半夜之後，在薄暗中，遠處隱約着一位這樣的粉面朱唇，就是現在的我，也許會跑過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誘惑得上弔。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楊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這一句，也還是剛從克士那里聽來的。但那大略，是說後來去做童養媳，備受虐待，終於弄到投繯。唱完就聽到遠處的哭聲，這也是一個女人在啣冤悲泣，準備自殺。她萬分驚喜，要去「討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弔」

來，主張應該他去討。他們由爭論而至動武，女的當然不敵，幸而王靈官雖然臉相並不漂亮，却是熱烈的女權擁護家，就在危急之際出現，一鞭把男弔打死，放女的獨去活動了。老年人告訴我說：古時候，是男女一樣的要上弔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弔神，纔少有男人上弔；而且古時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處，都可以弔死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弔神，致命處才只在頸子上。中國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後，也還是不要死的，那時的名稱，紹興叫作「鬼裏鬼」。但男弔既然早被王靈官打死，爲什麼現在「跳弔」還會引出真的來呢？我不懂這道理，問問老年人，他們也講說不明白。

而且中國的鬼還有一種壞脾氣，就是「討替代」，這才完全是利己主義；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們相處的。習俗相沿，雖女弔不免，她有時也單是「討替代」，忘記了復讎。紹興煮飯，多用鐵鍋，燒的是柴或草，煙煤一厚，火力就不靈了，因此我們就常在地上看見刮下的鍋煤。但一定是散亂的，凡村姑鄉婦，誰也決不肯省些力，把鍋子伏在地面上，團團一刮，使煙煤落成一個黑圈子。這是因爲弔神誘人的圈

套，就用煤圈鍊成的緣故。散掉煙煤，正是消極的抵制，不過爲的是反對「討替代」，並非因爲怕她去報讎。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喫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祕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爲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于是有人慨歎，以爲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爲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却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爲大多數所忘却。

我以爲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虜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狠。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爲了他駁斥康有爲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

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却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餸。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祇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螻虻羞爭蝻，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爲了先生的文章古奧，索解爲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爲了他

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爲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爲他是學者，却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記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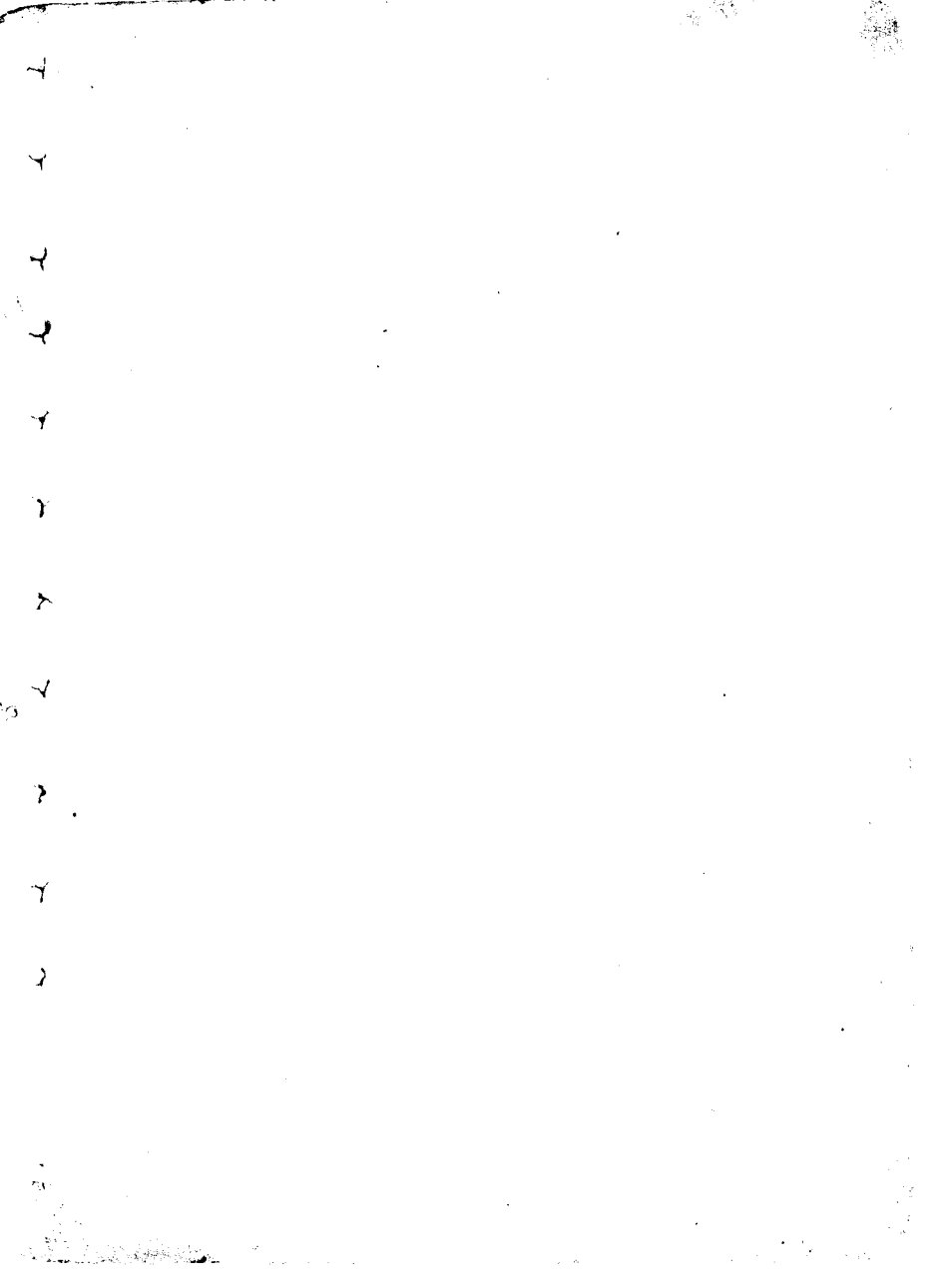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爲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爲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爲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衆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爲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却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却實地，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尙係發源于先生的「中華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爲鉅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

不多了。既離民衆，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餽贈，遂每爲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僮，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爲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銜。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于手定的，大約以爲駁難攻訐，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于「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爲儒宗，執贊願爲弟子者羣衆，至于倉皇製「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

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却無從知道。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後記

魯迅先生的文章，倘若是他活着的時候，要我來編輯，我一定老早逃開了，因為這就好像要海嬰來替我做事情，一樣的感覺不合式。

不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豫告，早已登過有一本「夜記」。現在離開豫告好久了，不兌現的事情，是魯迅先生所不大肯做的。——就在這個意義上，我纔敢于編輯這一本書。

我查那些遺稿，其中「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弔」四篇，是去年大病之後寫的，另外放在一處。好像聽他說過，豫備做「夜記」的材料，不幸沒有完成。我祇好從一九三四年編好而未出版的「雜文集」裏選兩篇，三五年「雜文二集」裏選四篇，三六年「雜文末編」裏，除「夜記」四篇外，再加四篇，共十四

篇。

上面所選的文章，好多篇被賊取版權的書商偷印出來了。可是脫漏，訛誤的地方非常之多，這是于讀者有損的，所以仍有付印一下的必要。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起，兩三年來發表的文章時常提到病。但是，病並沒有能夠屈服他的反抗精神，就在這薄薄的一小冊中，便可得其大概。

而且他作為中國的代言人，向強鄰表示抗議了。這裏收集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陀斯妥夫斯基的事」、「我要騙人」三篇，就直接在彼邦的刊物上投下幾顆手榴彈，引起了他們社會上的驚詫。除了魯迅先生，我們再從什麼地方找這樣大膽的「抗×」的正當言論呢？

讀者還記得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是檢查得最嚴厲的時候罷。這裏第一篇「病後雜談」是投稿到「文學」的，待到四卷三號登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刪掉了第五段，最爲魯迅先生所不懂。他在一九三四年的雜文「附記」裏說：「……但是

我總不懂爲什麼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追悼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爲我死了會開追悼會的麼？未了他結束道：「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不幸魯迅先生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死了。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他究竟活在怎樣的地方，活在怎樣的時代。

「病後雜談之餘」爲作者原題，就是後來見于「文學」的「病後餘談」，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的題目也犯忌，被改掉了。現在，人也死去了，如果不是意在對死人顯威風，這一點的文風總也可以存留的罷。本文的黑點，是作者親自記出來的，他在雜文「附記」裏說：「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爲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說「言行一致」云云，也許莫明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爲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在「雜文二集」的「後記」裏，說到：「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

號的「改造」雜誌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聖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與高采烈。會由亦光君譯出，載于「雜文」雜誌第二號（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里。」

「關於「陀斯妥夫斯基的事」是應三笠書房之託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里，說明着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

「題未定」草的「四」，「文學」下面寫：「不發表」的遺稿中編目裏却有這一項，而且原稿紙也寫出了題目，可見是豫備寫起來的了，可惜的是因爲病擱下了，沒有能夠寫出。

魯迅先生自己編文集是按年代的，他在遺著「雜文集」裏說：『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知人論世，非看編年不可……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

而且大抵注明月日，所以這本子裏也依作者原意。其中「半夏小集」未有註明，這是因爲他在夏天大病之後，剛剛有點文思，但是還沒有能夠敷佈成文，故成了七首式的。這原稿用的是「抄更紙」，當時他曾感慨地說：『病後看見有格子的紙也寫不方便了，必須要全白的。』所以我把這篇文章放在「夜記」之首。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夜，魯迅先生逝世後三個月又五天。許廣平編後記。